

许为民 王彦君

有人认为，科学哲学似将风光不再。的确，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的科学哲学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科学合理性的论证困难重重、科学元方法论的研究难以为继，……基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对此，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们做出的反应是以创新应对挑战。他们有的从诠释学传统中寻找科学解释的资源，有的用科学实在论的讨论取代合理性的讨论以寻找一条底线，也有的从元方法论转到各门具体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还有的试图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寻找跨学科研究途径。可见，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形式，科学哲学都处于新的探索中，它非但没有萎缩、凋零，相反显出勃勃的生机。我国科学哲学的兴旺可以从近年新增博士点数、发表论文数以及两年一度的全国科学哲学大会的规模中看出来。2003年8月19日至21日，第11届全国科学哲学大会在温州举行，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的学者、研究生参会人数达140人，超过历届全国科学哲学大会。本次会议设立的三方面主题充分体现了回顾性与前瞻性的两种使命的统一。

1.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依然是我国科学哲学界研究的主要方向。物理学一直都是科学哲学的研究重点。本次会议上，许多学者分别就量子真空理论的本体诠释、量子论与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重构的表征主义、主体间性、客观性与量子力学的测量等问题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郭贵春认为，在我国科学哲学研究中关于科学解释和测量问题、自然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其地位仍然十分巩固。但是，对这些问题研究还须以方法与进路的创新为前提。只有对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作出批判反省和重新评价，方能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已存在的问题。

与分析哲学不同，诠释学及其与实用主义结合所形成的语用学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语境。对传统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问题、归纳问题、观察与理论的关系、理论的演化问题，诠释学都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但它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一种原本只适用于人文学科的方法，究竟能否适用于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它能否在客观性的问题上坚守底线，从而避免与主流科学观念相左。范岱年对海兰科学诠释学思想的介绍，曹志平就科学文本诠释的探讨，都是这方面有益的工作。

迄今为止，在固守客观性底线问题上，科学实在论依然是一种最便捷、最有效的路径。当然，这一进路并非就是完善的了。林定夷指出了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四大难题：人类的感知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语言与感知的关系问题，归纳问题和理论的多元性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科学实在论不像是一种哲学理论，它更像是一种面对反实在论挑战时所持的态度。翟振明坚持认为，他已经驳倒了实在论的核心论证。本届会议上，两种态度的对峙依然分明。当然，反实在论的意思仅仅是说，科学理论的成功不能也无需仰仗于实在论的解释。盛晓明认为，客观性对于科学活动来说是必要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根据与标准；客观性是一个历史概念。他对客观性三重根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反实在论立场。

科学哲学日渐趋向于对各部门科学的哲学研究。在生物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简单地套用来自物理学的元方法论是很难行得通的。方法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胡新和、吴彤、桂起权等分别就认知科学、复杂性科学与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作了大会发言。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认识到了科学方法的多元性，对科学元方法论的考察将逐渐淡出科学哲学。但是随之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对具体科学方法的探讨是哲学的任务还是科学自身的任务；在元方法论之外，哲学将以何种身份出现。这些问题还将关系到科学哲学究竟是要定位在一种规范性的学科上，还是会演变成一种描述性学科的问题。

科学技术中的伦理学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科学哲学的热门话题。邱仁宗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第12届国际科学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科技伦理问题占了很大比重。廖小平探讨了胚胎人权问题给家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带来的冲击。翟振明提出一种有别于“客体技术”的以改变人本身为目的的“主体技术”概念。主体技术涉及到了终极性的价值伦理问题，即我们是否以及能否重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验世界；如果能，按何种价值标准去重塑；这种技术将对人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2. 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国内对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哲学思考已有时日。虽然，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科学至今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是如今持肯定态度者的阵容日渐扩大。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具有的事实（社会实在）是由人们的参与和价值介入形成的。那么，其客观性何在？其可预测性又如何？这些问题绝非可有可无。随着社会科学成几何级数的增长，它们必将演变成为科学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曹天予在“社会科学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把政治学、经济学问题纳入哲学的思考与其说是理论性的奠基问题，毋宁说是关于中国今后选择走什么道路的实践问题。这体现了海外华人学者强烈的使命感。也有的与会代表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用既有科学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思考社会科学是否合适；即便合适，能否从中引申出实践性的结论。

很显然，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以物理学为对象建构起来的，很难套用于社会科学。问题是，除此之外我们尚没有别的研究范式。不过研究还是获得了进展。黄华新等对社会科学中的反身性特征的考察，从杭青等在陈词理论及其辩护方式上别具特色的研究，对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3.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列为科学哲学大会的主题，这还是首次。我们知道，包括劳丹在内的哲学家们一直对社会科学介入认识论问题持有戒心。自上个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建构论纲领兴起以来，默顿学派之所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很大程度上与它没有直接介入认识论问题有关。科学社会学只讨论科学的规范性结构。但是，通过社会学而不是哲学来解决认识论问题又

将如何呢？一些哲学家认为，这势必导致科学合理性的崩溃。到了80—90年代，科学哲学对SSK的态度逐渐由拒绝与排斥转向了接纳与吸收。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即科学哲学必须改变自己的传统形式，用一种类似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眼光重新打量科学活动。在SSK研究上通常存在社会学和哲学两种视角。一般说来，哲学视角更关注科学合理性问题。刘晓力认为，SSK在说明自己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合理性时，采取的仍然是一种理性主义辩护策略；孙思指出，SSK和科学哲学并非是两个对立的、互相竞争的研究纲领，可以从研究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将它们区分开；黄瑞雄分析了SSK对科学知识的解蔽及其后果以及SSK的知识论与波兰尼意会知识论的相通性。

科学哲学向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开放，分析哲学向诠释学与语用学的开放，在创新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下来的路将怎样走？我们的科学观念将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如何直面女性主义、地方性知识与本土科学观所提出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美已形成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态势。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空间，科学技术学进路将有助于我们在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在普遍性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之间，在科学方法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寻到交叉点。

我们期待着下一届科学哲学大会能在这些前沿问题上有更大突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书评·（《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